

贡献与缺憾 :梁启超史学思想再审视

——中国近现代史 97、98 级博士生与导师笔谈录

杨树标 梁敬明 段治文 邢乐勤 李元江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他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而是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合理内核,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的局限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的缺憾。梁启超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大势浑然一体,梁启超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因素,也夹有唯心因素,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关键词]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史学思想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0)05-0065-11

On Liang Qichao's Historical Ideology

——Discussion among Grades 97/98 Ph.D. candidates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ir tutor

YANG Shu-biao, LIANG Jing-ming, DUAN Zhi-wen, XING Le-qin, LI Yuan-ji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The criticis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y by Liang Qichao was cogent and comprehensive. He didn't just deny it thoroughly but made efforts to draw the reasonable cores from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instead; on the basis of severe criticism of the traditional history and enthusiastic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history, Liang Qichao advanced "revolution in history" and advocated "new history", which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Its limitation confirmed in a way the regret of modern history; Liang Qichao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into historical science and re-considered the la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which wholly embodie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storical theory. All this mixed together with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ideology; Liang Qichao's historical ideology was pluralistic, containing both materialist factors and idealistic factors. And many causes led to this phenomenon.

Key words: Liang Qichao; 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historical ideology

杨(杨树标 教授,博士生导师)学习与研究历史,总得有一个方法。梁启超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的创始人之一,是西方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最早的传播者和中国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奠基人,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曾被当作史学入门的教科书,对我们学习与掌握研究历史的方法很有助益。通过研读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我们可以就以下四个问题对梁启超史学思想的贡献与缺憾作些探讨:其一,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其二,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贡献;其三,梁启超对历史规律的探索;其四,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多元性。

[收稿日期] 1999-12-08

[作者简介] 杨树标(1938-)男,浙江温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国人物及当代中国史研究;梁敬明(1965-)男,浙江玉环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97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段治文(1964-)男,浙江常山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97级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邢乐勤(1960-)女,浙江嵊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98级博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研究;李元江(1957-)男,浙江上虞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9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一、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

邢乐勤 副教授 98级博士生) 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多年的积累、提淬之后,才发之肺腑、形诸文字的。戊戌变法前,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一度为康有为左右,缺乏独立的见解。变法失败后,他东渡日本,“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① 1901年至1902年,他接连发表震动一时的《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猛烈抨击封建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较系统地阐述了有关史学功用、历史哲学、治史态度和方法等一系列资产阶级史学主张。此后,他的史学思想和理论得到不断纠正和完善,终于在1920年完成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梁启超在该书的自序中说:“启超不自揆,蓄志此业逾二十年,所积丛残之稿亦既盈尺。顾不敢自信,迁延不以问诸世。客岁在天津南开大学任课外讲演,乃裒理旧业,益以新知,以与同学商榷。一学期终,得《中国历史研究法》一卷,凡十万言。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吾治史所持之器。大略在是。吾发心殚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创造一新史。吾之稿本,将悉以各学校之巡回讲演成之。其第二卷为《五千年史势鸟瞰》,以今春在北京清华学校讲焉。第三卷以下,以时代为次,更俟续布也。”^② 从这段自序中可以看出,梁启超撰写此书早有打算,并且积累了大量的资料,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探索,才正式刊行于世。在书中,梁启超以早期史学思想为基础,同时又受到西方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新康德主义、实用主义等影响,建立了相当完整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史学体系。在这个体系下,梁启超对史学的意义与功能、传统史学的批判与改造、史料的整理与鉴别以及史迹的论次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其中有的不乏真知灼见,也提出了不少合理的、有价值的建议。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启超批判旧史学的服务对象狭窄,他说:“质而言之,旧史中无论何体何家,总不离贵族性,其读客皆限于少数特别阶级——或官阀阶级,或知识阶级。故其效果,亦一知其所期,助成国民性之畸形的发达。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③ 由于旧史学的服务对象限定于帝王官僚和知识分子,故略于“人生日用饮食之常识的史迹”和“一般民众自发自进的事业”,因而造成帝王学和官僚知识分子之学发达,而大多数老百姓的智慧却得不到记载和继承。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指责旧学关于古代文化研究中的许多主要遗漏,他说:“旧史因专供特殊阶级诵读,故目的偏重政治,而政治又偏重中枢,遂致吾侪各所认为极重要之史迹有时反阙不载。”^④ 梁启超认为,这种旧史学体系已不适合历史发展之需要,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每一社会个体都有高度发达的道德和智慧才能组成社会,求得生存与发展。所以,他提出要将过去的“皇帝教科书”变为“国民资治通鉴”和“人类资治通鉴”,即“质言之,今日所需之史,则‘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而已。”^⑤ 因此,史书的内容应包括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各个方面,而且要论述发展过程,科学地阐述其形成、发展和未来的方向,内部各民族的斗争融合,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在世界上的地位和贡献等。梁启超还进一步批评旧史学体系忽略对于历史内在联系的挖掘和分析,指出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记叙人类社会赓续活动时,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可是,“古代著述大率短句单辞,不相联属”,即以“纪事本末体”而言;“亦仅以一事为起讫,事与事之间不生联络”,^⑥ 为此他提出:“善为史者之驭事实也,横的方向最注意于其背景与其交光,然后甲事实与乙事实之关系明,而整个的不至变为碎体。纵的方面最注意于其来因与其去果,然后前事实与后事实之关系明,而成套的不至变为断幅。是故不能仅以叙述毕乃事,必也有说明焉,有推论焉。”^⑦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是本着去芜

存真的科学态度,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其合理的内核。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梁启超对古代史学体系作了一些分析,大致勾勒出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线索,高度评价了左丘明、司马迁、刘知幾、郑樵、司马光、章学诚等人的史学思想,并且注意到他们的史学思想与新史学的某种联系。梁启超指出:“司马光与班固”在历史观念上“有很大区别”;《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历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历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3]而章学诚的史学观点“与近代西方之史家言多有冥契”^[3]。此外,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考据功夫也极为看重,认为乾嘉朴学以及古代史料的考伪传统,都是新史学的基本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专门就史料的分类、搜集、鉴别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第一,在史料的分类方面,“文字记载的史料”和“文字记载以外者”各有长短,应结合使用,不可偏废。第二,在史料的搜集方面,史料散在各处,必须搜集方能得之,单一件史料,无足轻重,等到汇集了若干同类史料进行比较,则意义的价值全然不同。要想到这些史料,必须经常注意“常人所不注意之处”,在常人认为不是史料的东西中去找出可贵的史料来。同时还要“博搜旁证”,“随处留心,无孔不入,每有所遇,断不放过”^[3],以补充和纠正旧史学故意湮没或搞错了的史料。第三,在史料鉴别方面,要求得真史料,就必须进行正误辨伪。在正误方面,要做到正确地鉴别,除了正面考察之外,还可运用反证的方面。反证材料不足时,又可运用假说的方法,“以待后来之再审定”。同一历史事件,若材料相互矛盾时,则要坚持“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之原则。除此以外,梁启超进而在辨伪方面又提出了鉴别伪书的12条方法和证明真书的6条方法,并认为伪书中有真书,真书中也有伪书,而“伪”与“误”是有区别的。史料的“正误辨伪”主要在“求真”,“其夙所因袭者,则重加鉴别,以估定其价值,如此则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而推论之功,乃不至枉施也”^[3]。

二、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贡献

杨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他对史学的贡献之一。可以从史学发展应有的延续性角度,将梁氏对史学的贡献展开来加以研究。

梁(梁敬明 副教授 97级博士生)站在21世纪重新审视上一世纪中国史学的历程,对于新世纪中国史学的新发展必定会有启示和裨益。前一个世纪之交正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重要时期,而梁启超正是这一演进的最关键人物之一。

最近十数年来,人们对梁启超的关注似从政治领域向学术领域转移,终其一生的评价也注重其学术因素。政治表现毁誉参杂,前期虽为维新骨干,却也只是康有为的追从,后期则日趋保守;而其学术成就则以洋洋千万文字,从数量到质量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国学大师美名播世。作为史学家,梁启超以后人无法比拟的史学著述及首创的新史学思想,证明了他在近代史学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贡献。

首先是对传统史学的强烈批判意识。梁启超接受过较为全面的封建正统教育,经受了严格而系统的旧学训练,深得传统文化泽惠,同时对传统文化缺陷知之甚清,批判尤烈。戊戌变法期间,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传统史学有许多弊端,中国古史大多为君王之史,是君王的家世谱牒。在《新史学》中,他把传统史学的缺点概括为“四弊二病”。其后的史学论著,包括《中国历史研究法》及续编,在对传统史学的态度上一直未变。梁启超以扎实的功底及对传统史学的充分把握作为思考与探索的基础,他对传统史学的批判尽管十分偏激,但却浸透着对新史学的渴望:“凡一新学派初立,对于旧学派,非持绝对严正的攻击态度,不足以摧故锋而张新军”^[4]。

其次是对西方史学思想的热情介绍。19世纪90年代前期,20岁左右的梁启超已受西学熏陶,

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期间涉猎了许多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著述,利用他们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中外历史,并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批判。从1899年至1904年,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介绍了卢梭、霍布士、斯宾诺沙、达尔文、笛卡尔、培根、孟德斯鸠、康德、亚当斯密、斯宾塞、叔本华等人的思想。他在日本所接触的书籍,史著的比重很大。他在《东籍月旦》中介绍了一批日本书籍,总计七十多种,其中史著占五十种之多,如浮田和民的《史学通论》、坪井九马三的《史学研究法》等影响极大。他希望通过西学的介绍和引进,促进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

再次,正是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和接受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史界革命”之主张,倡导“新史学”。他批判了传统史学的“循环论”,提出历史进化的理论,认为历史发展存在着“公理公例”,他批评了传统史学的价值标准,提倡全民本位的价值标准,认为帝王将相不应是历史的主宰,应该探究人群的活动,他还提出研究历史的一些具体办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提出的进化史观正是新旧史学的主要区别,进化史观作为近代史学的核心内容,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的显著标志。

梁启超高举“新史学”大旗,他的努力在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史学会会长戴逸在回顾20世纪中国史学历程时,对梁启超作了高度的评价:“近代第一位起而呼唤新史学诞生的是梁启超。他批评了传统史学的弊端和不足,提倡近代的史学观念和方法,写了历史研究方法和学术文化史方面的著作。他是近代历史学诞生的助产婆”^[5]。梁启超对新史学的呼唤,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后史学嬗变长期酝酿的结果。

如同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灿烂,中国古代史学的起点之高及总体的高度发达应是毫无疑问的,但明清之际史学在延续发展的同时,也因政治因素而出现偏离和低迷徘徊。鸦片战争后,与局势剧变相一致,传统史学的延续发展出现了对乾嘉学术流弊的反动和正统史学复归的趋势,大批史家开始改变原来只注重考据而不事著述的习气,纷纷转笔撰写元、明、清史(也即当代史)。随着封建王朝国门的被打破,西风东渐,人们的视野逐渐开阔,思想初步解放,认识能力相应提高。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新思潮,传统史学经世致用义旨因时代而被赋予新的内涵,并被广泛认同,摈弃“皇帝教科书”之类通鉴,撰写“国民资治通鉴”、“人类资治通鉴”,已成为大多数史学家的取向。可以说,新史学的要求已是呼之欲出了。在这一背景下,梁启超的“新史学”呼吁无疑顺应了近代史学发展的方向,由此也奠定了梁启超的史学地位和贡献。

是否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已完全涵盖了治史之道?其史学思想可否作为近代史学完全发展的代表?不容否认,梁启超的局限也是确定无疑的。这种局限有多方面的表现:对传统史学批评的过于偏激;对西方史学思想较为简单的接受(有人认为甚至是移植);其史学思想的非唯物论成分;其史学思想的“多变”直至后期的倒退;史学研究方法的缺少突破等。学术界有关梁启超史学思想或理论的研究对以上的局限多少都已指出,其中就局限的评论虽也有可探讨的地方,如关于移植问题、非唯物论问题以及后期退化对前期的否定问题等,但总体上的评价还是一致的。那么,透过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局限能否说明近代史学演进的缺憾,如果存在局限和缺憾,那么导致这种局限和缺憾的原因又是什么?

杨：透过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局限性可以说明近代史学演进的缺憾,那么,导致这种局限和缺憾的原因又是什么?

梁：毫无疑问,梁氏的局限能从一个侧面印证近代史学的缺憾。导致这一种局限和缺憾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近代史学形成条件铺垫的不成熟以及政治重负下理性发展的缺失。

中国近代史学是传统史学的一种继承、提升,之间有内在的逻辑发展关系,但就传统史学在近代史学形成条件铺垫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是不成熟的,这种不成熟很大程度上是指历史哲学发展的不充分。历史哲学的兴起早已有之,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对中国古代史学哲

学和近代史学哲学的形成都作了一定的介绍,但以探求人类历史发展终极原因为目的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作为较高层次的史学形态和方法论,是人类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在西方,建立历史哲学的任务首先是由18世纪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提出的,其目的是为把哲学的、思辨的灯光带入历史研究,以倡导一种包罗万象的人类文化史。此后,经赫尔德、康德至黑格尔,历史哲学在19世纪经历了蓬勃发展的过程,以至这个世纪被称为“历史学家的世纪”,西方近代史学的兴起也被看成是“哥白尼式的革命”。中国近代史学和西方近代史学的形成从时间上讲尽管略有差异,但大致是一致的,都在上一个世纪之交。如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西方近代史学是以思辨的、成熟的历史哲学为铺垫,以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为支持而形成起来的。相反,中国近代历史哲学发展的不充分,中国资产阶级的多舛命运,决定了中国近代史学的先天不足,梁启超意识到要建立史学理论也即历史哲学:“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6]。但梁启超对历史哲学的理解显然是简单的,只强调用进化史观来研究历史。反观梁启超对西方史学思想的介绍,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把握是缺乏的,不可能完整地吸收,也谈不上很好地消化,这一点恐怕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潮在中国传播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近代以来,学术的发展一直背着政治的重负。鸦片战争后,中国进步人士与国家共兴亡、与民族同命运,他们一切追求的出发点就是抵御外国侵略,拯救民族危机,实现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学术研究、改良维新、政治革命等都以此为目的,史学的发展也不例外,传统史学经世致用的思想被赋予新的内容,并和救亡图存的民族危机意识融合在一起,历史学家大多首先是一个爱国者。作为中国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的典型,梁启超具有渊深的国学功底,又能融贯中西。但在政治重负下,他振兴学术的期望首先要满足救国的需要,振兴学术的目的是为了救国。梁启超一开始就把“史界革命”的口号和救国的任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6]当然,学术与救国的关系是特殊历史背景下必然的选择,但就学术本身的发展而言,则使学术的理性发展受到影响和冲击。也正是强烈的政治或历史使命感,使得他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上显得十分偏激。

三、梁启超对历史规律的探索

段(段治文 副教授,97级博士生):我们注意到,梁敬明在发言中将进化观称作近代史学的核心内容。我认为,除了进化史观这个核心外,还有一条中轴线,那就是梁启超等人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求。

杨:你是研究思想史的,你能不能从近代中国思想变迁对探索历史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出发,谈谈梁氏的追求和努力?

段:早在19世纪末,作为一位探索救国真理的先进人物,梁启超就以极大的热情接受了进化论学说。到20世纪初,他就把进化论引入历史领域,对中国封建史学从历史观到研究方法进行了一番系统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刷新了对历史的认识,提出了历史存在发展规律的观点。他在《新史学》中为历史规定了三大“界说”:“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者也”^[6]。梁启超还进一步指出:“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历史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6]可见,他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而历史哲学之任务即在于探索“人群进化”之“公理公例”。这就冲破了史学界一直存在的“陈陈相因”的“天不变,

道也不变”的历史不变论(董仲舒)和“一治一乱,治乱相嬗”说(孟轲)、“五德经始”说(邹衍)、“元会运世”说(邵雍)等等历史循环论的束缚。而梁启超把西方进化论引进历史领域,提出建立历史哲学的任务,以探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他对历史认识的高度,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封建史学而言,无疑是一场革命。

不仅如此,梁启超还提出历史的发展并非“为一直线”,而是“或尺进而寸退,或大涨而小落,其象如一螺线。明此理者,可以知历史之真相矣^[6]”。这已包含了对科学历史规律的把握。他还以螺旋形进化的观点批判了孟子的历史循环论。他指出,孟子“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的历史循环论是由于误认“螺线”为“圆状”所造成的,是“误会历史真相之言”,而历史发展真如孟子所言“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他指出,孟子的错误正在于“未尝纵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之尔^[3]”。这里包含有确认人类历史为统一的整体,如否认历史之进化发展,否认存在规律性,历史就不能成为科学的重要思想。

梁启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还集中体现在他对历史因果律的揭示上。梁启超认为,历史事件是相互制约的,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民族之活动,都有环环相扣的关系,“史之为态,若激水然,一波才动万波随^[3]”。他认为,“凡属史的范围之事实,必其于横的方面最少亦与他事实有若干之联带关系,于纵的方面最少亦为前事实一部分之果,或为后事实一部分之因^[3]”。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例举大量史例,指出中国历史上刘项之争与中亚细亚及印度诸国之兴亡有关系,而影响及于希腊人之东陆领土。由此认为,中国与西方地域相隔遥远,“而彼我相互之影响犹且如此之巨,则国内所起之事件,其首尾连属因果复杂之情形,益可推矣^[3]”。这正证明人类的历史活动息息相关,“如牵发而动身,如铜山西崩而洛钟东应”。“因缘生果,果复为因,此事理当然之程序也”。因此,“说明事实之原因结果,为史家诸种职责中之最重要者”。梁启超坚信:“不谈因果,则无量数繁赜变幻之史迹不能寻出一系统,而整理之术穷;不谈因果,则无以为鉴往知来之资,而史学的目的消灭^[3]”。这种对历史因果律的探索,实际上也就是对“历史运动”规律的探索,无疑对学界颇具启发意义。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系统地告诫史学家要明了历史因果律和自然界因果律两者的不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反复的、完成的,而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一度的、不完成的”;“天下从无同铸一型的史迹”,此其一。其二,自然科学的事项,常为普遍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为个性的。“凡成为历史事实之一单位者,无一不各有其个别之特性”。其三,自然科学的事项为超时间、超空间的;历史事项反是,常以时间、空间关系为主要基件。故“史迹之为物必与‘当时’‘此地’之两观念相结合,然后有评价之可言”。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梁启超由此论述了历史运动是由各个怀有各不相同目的的个人之活动总体构成,在有意无意、错综复杂之间,形成了似乎是向着共同目的前进的趋势。他说:“合无量数互相矛盾的个性,互相分歧或反对的愿望与努力,而在若有若无之间,乃各率其职各赴一鹄,以促成此极广大极复杂极致密的‘史纲’,人类之不可思议,莫过是矣。史家之职责,则在此种极散漫极复杂的个性中,而觑见其实体,描出其总相,然后因果之推验乃可得施。^[3]”梁启超这种强调史家要通过千差万别的不同个人的动机,专求历史运动的“总相”,从中寻找因果规律的观点,与唯物史观论历史运动的“合力作用”不无相通之处,具有极高的哲理上的价值。

梁启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但如果进一步跟踪追索,会发现它又是与近代中国思想大势演进浑然一体的重要内容。

首先,梁启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是近代中国进步力量寻求社会变革出路的必然结果。19世纪40年代,西方舰炮轰开了中国大门,由此逐渐破坏了传统历史发展的稳定性和连贯性,先进的中国人士开始从原来“辉煌文明”重负下所产生的“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心理束缚中挣脱出来,“救亡图存”成为此后进步思想界发出的历史最强音,探寻中国社会变革的出路,也成为近代中国开

始以后的历史新课题。由于历史行程的急遽变化,特别是由于中国在世界上历史地位的迅速逆转,创树新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的变革,已成为先进的中国人必须承担起的历史使命。而这其中,正如梁启超所说:“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未由明了。”可以说,从魏源提出“地气天时变,则史例也随时而变”^[7],到19世纪70至80年代王韬和黄遵宪结合亲身在欧洲和日本的考察实践,分别著成《法国志略》(1872)和《日本国志》(1877),力图以此作为本国的千秋史鉴,打破国内守旧派“足己自封”的迂腐观念所作的努力,都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演进对历史发展规律探索的时代要求。经过戊戌变法政治实践,梁启超开始思考历史动力问题。1898年,他就对变法以后的历史发展提出了一种所谓“动力”与“反动力”、“反反相续说”。他说:“革新之机,如转巨石于危崖,不动则已,动则其机势不可遏,必赴壑而后止。故最要者莫过于动力。有动力必有反动力,有反动力又必有其反动力之反动力。反反相续,动动不已,而大业成焉。”^[8]而随着中西比较及对近代思想研究的展开,到20世纪初,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树立新的史观体系,更势所必然。

其次,梁启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又是他总结治国经验、认识国家积贫积弱根源以及启迪民智的重要内容。随着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大潮层层推进,到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以敏锐的洞察力,在改革实践及中西对比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造中国国民性的时代课题。梁启超起初在《清议报》上发表一系列论文,抨击中国人奴性、旁观等“劣根性”,提出新时代新国民应有的“德性”。接着,从1902年开始,他又在《新民丛报》上连载了十万余字的专著《新民说》,全面剖析几千年封建文化积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国民性的弊端及其根源。与此同时,严复也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思想,认为“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9]。这一场势所难挡的改造国民性的大潮,到1915年开始已经演化成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然而,如何改造国民性,从而启迪民智,为中国改革构建强大的社会基础?对此,启蒙思想家们的论述极其丰富。在学术上有深厚素养、又极重史学社会功能的梁启超,深感史学变革在这方面的重要性。他早在《变法通议》中就广泛引用国内外史实,论证变革乃历史的必然。他指出,中国历史与西方近代史学存在着根本区别:“中国之史,长于言事;西国之史,长于言政。言事者所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谓之‘君史’;言政者所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谓之‘民史’。”^[10]这样,他已把史学提高到治理国家和改造社会之有力工具的高度。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经过维新变法被封建专制势力残酷绞杀的惨重教训以及国民冷漠的心理悟感,更进一步认识到进行思想启蒙、提高民众觉悟、灌输民权意识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向民众揭示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他在《新史学》中,开宗明义地标明了史学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史学是“学问最博大而切要”的一门,是“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他认为旧史陈腐落后之根源,正在于完全违背国民意识和进化观念,旧史家不懂得史学之可贵,正在于他们不懂得通过叙述人群之进化,不探究事物间的因果联系。“虽尽读全史,而曾无有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起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也即要真正使史学能启迪民智,必须对不叙述人群之进化、不探究事物因果联系的“旧史”进行彻底改造。正是站在这种启蒙与救亡的高度,梁启超以凌厉的攻势、廓清摧陷之功,批判旧史即“君史”奴化国民、阻挡时代潮流的危害,开始潜心探究历史因果进化之规律。

再次,梁启超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更是西学传播为中国人民带来了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后,近代中国学术范式变革的重要体现。19世纪末的最后30年,西方文化输入之风日盛,译书大量增加,西方科学文化尤其是进化论学说的传播,为先进的中国人带来了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严复的《天演论》等对进化论学说加以发挥、创造,更形成了一套具有强烈警醒作用的世界观、历史观。这有力地推进了中国学术范式开始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我们知道,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经学乃是国学之根本。在经学家看来,所谓六经者,圣人代天地言道之书也。六经未

作,道在大地,六经既作,道在六经,从而结束了先秦子学时代,而且把学术本体由自然转向经籍,整个学术也只剩下通经一项。如此延续几千年未变。到清代,考据学已成为经学正统。19世纪后期,随着中国学者对西学从零散到综合、从局部上升到整体、从表层进入深层的认识之后,传统经学范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考据学迅速衰落,而在西学传播中确立起来的科学观念则成为中国学者重构现代学术体系的起点。科学观的确立,直接促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范式革命,而进化论思想正是在这一科学观念传播之中,被当作自然、宇宙的终极真理,当作社会、人生的根本之道而为知识界广泛接受。进化论沉重地打击了传统经学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进化、发展的直线取代了经学循环往复的圆圈,进化论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第一个规范。而作为中国学术前沿和显学的历史学,自然成了这一范式革命中首当其冲的学科,也成为这一范式革命成功与否的重要决定因素。将进化论引进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规律,自然成了对这一学术范式进行革命进而完成近代整个思想变革的重要体现。

四、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多元性

李(李元江 副教授 98 级博士生)·梁启超史学思想还具有多元化的特点。由于历史的局限,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不可避免地呈现出精芜杂存的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的因素,也夹带着唯心的私货。

这种多元性首先表现在梁启超对历史发展动力的认识上。梁启超强调个人精神因素或心理因素在历史上起第一位的作用。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他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个人英雄史观”,即把推动和改变历史的力量归结为个别英雄人物的主观意志和才智的作用。他认为,历史上有两类人:英雄与群氓。推动历史发展的只是少数英雄人物,即他所说的“历史的人格者”,而群氓则只配扮演一种消极的角色,可有可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其客观规律的,并不是由人为的因素造成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梁启超却把历史的发展看成是个别英雄人物在历史舞台上主观意识和观念的表现,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这就使他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其实,我们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历史的发展是不会以某个人的存在和意志为转移的,没有这个人,历史照样要发展,无非是进程快一些还是慢一些。没有秦始皇,也许会出现夏始皇、周始皇;没有朱熹,也许会出现赵熹、王熹。因此,仅靠一两个英雄人物是不可能创造全部历史的。不过,梁启超“英雄造时势”的观点也有其合理的一面,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生产力低下,生活水平不高,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定要有一个领头人物出面来改变这一切。在社会实践中,这样的领头人物即梁启超所说的“历史的人格者”,也就应运而生,他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了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制出这样的人物来。”^[11]列宁也说过:“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使过去不可能发挥的天才发挥出来。”^[12]出现了这样的人物,历史发展的进程可能就会快得多,对历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种作用,一般民众是起不到的。

其次,梁启超史学思想的多元性也表现为对历史发展规律探索的迟疑与否定。梁启超这位“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13]在近代中国思想界以“善变”、“屡变”闻名,而他在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中也同样“自我交战于胸中”,出现了值得关注的徘徊与迟疑现象。1923年,就在梁启超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并将他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引向深入的第二年,他又做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演,作为“对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的修补及修正”。在这一讲演中,有两个极为醒目的标题:“历史里头是否有因果律”、“历史现象是否为进化的”,由此展开了对自

己史学理论的极大怀疑,甚至否定。梁启超首先对自己原来所下历史定义中,有“求得其因果关系”一语产生质疑。他说:“我近来细读立卡儿特著作,加以自己深入反复研究,已经发觉这句话完全错了!”^{14]}他认为因果律也即“必然”的法则,“必然”与“自由”是两极端,而“我们既然承认历史为人类自由意志的创造品,当然不能又认他受因果必然法则的支配,其理甚明”^{14]}。对历史因果律的否定,意味着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否定,其结果是进而对他以前笃信不疑的历史进化论发生了动摇。他说:“孟子说:‘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句话可以说是代表旧史家之共同的观念。我向来最不喜欢听这句话,因为和我所信的进化主义不相容,但近来我也不敢十分坚持。我们平心一看,几千年中国历史是不是一治一乱的在那里循环?何止中国?全世界只怕也是如此。”^{14]}这几乎向历史循环论投降了。但他对进化论毕竟多情,在否定之中,又“重新修正进化的范围”,认为历史现象中只有“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以及“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是进化的;其余只好编在“一治一乱”的循环圈内了。^{14]}

杨 梁启超史学思想的两重性确是个有意义的话题。是否能就此再分析一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

李 首先,这应该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的一大特色。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强烈要求吸收西方近代哲学和政治理论,以指导自己的社会实践。与汹涌而来的西方人文思潮一道,各种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成果也被引入到史学领域。梁启超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提出了将求得“公理公例”作为史学目的的。但是随着物理学上一系列成果的出现,特别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产生,动摇了建立在旧自然哲学观上的机械决定论而转向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也动摇了梁启超先前从西学中获取的哲学理念。从1918年至1920年,梁启超周游欧洲期间接触了西方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史学家的思想观点和史学理论,这造就了他“史迹是人类自由意志的反映”的唯心史观,并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有较明确的阐述。

其次,这应该和梁启超的政治实践有关。作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深信其政治主张顺天应人,必然实现,故对历史也力主有“公理公例”可循。不幸的是,近代中国的社会现实对变革极为冷漠,对新学多持拒斥态度,这使变革者在宣传新思想及倡导变革时,常感孤立无援,身心憔悴。梁氏多次和其改革同伴及好友言及内心苦衷。1897年春,他和严复谈及改革之艰难时说:“一思变甲,即须变乙,至欲变乙又须变丙。”^{15]}其中层累曲折,阻力重重,变幻不测,非屡经其事不能知。甚至在“输入欧美之学术”时也还顾及“社会妖新学如仇”,不敢“公然行事”。1900年,他写了著名的《呵旁观者文》,该文道出了他“深为此惧”的原因,正在于“无血性”之国民性,认为“吾中国四万万人,皆旁观者也”。久而久之,梁启超对早年力主的“公理公例”不能不产生怀疑。

再次,这也和当时世界形势的变化有关。正当梁氏在国内宣传西学的过程中,为自己陷入价值与现实冷漠这一矛盾境地而苦苦挣扎时,标榜“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西方人,竟在进化论的大旗下,发生了空前野蛮残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大战将西方近代文化即资产阶级形态的文化带进了一片悲凉颓败之中,正如著名哲学家罗素所说:“欧洲文化的坏处,已被欧洲大战显示得明明白白”^{16]}。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惨重破坏形成的危机阴影笼罩着整个西方社会。在这种变幻莫测的形势下,原本就具有脆弱内心的梁启超更是不知所措。如果说现实的冷漠状况还可通过努力改变的话,那么,价值世界的坍塌,已使他全没了招架之功。正如他在《欧游心影录》中所说,如同一个“沙漠中失路的旅人”,为那拼命追赶的科学“黑影”的消失,而“无限凄惶失望”,于是机械地跟着西方人一道大呼“科学万能破产”。而此时的中国进步思想界和学术界却正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下完成着新一轮的艰难转换。这就是从进化论规范向历史唯物论规范的转换,这是在科学旗帜下的逻辑演进。从物种间的生存竞争到人类社会的阶级斗争,从天择原理到历史和经济决定论,中国学术无疑朝着科学求真方向不断深化。而梁启超在现实疑惧和价值坍塌的双重压力下,对原来建立在科学进化

论基础上的历史发展规律的探索的否定，也成自然之理。

五、再谈史学覆盖面和历史的“用”

杨 在讨论结束之前，我再顺着话题讲一讲史学的覆盖面和历史的“用”。

先来谈谈史学的覆盖面。我们知道，梁启超治学，以“务广求博”称闻于世，文史哲经莫不涉及，但其根基实植于史学。其友林志钧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紧密自守者在，即百变不离史观已。”其髫年即喜读《史记》、《汉书》，居江户草《中国通史》（此书未成，残稿尚在），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为文如《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及传记学案，乃至传奇小说，皆涵史性。^{¶17}现在做人文科学的人若要写出像梁启超那样高屋建瓴、气势磅礴的文章，看来也非有点历史学的功底不可。所谓人文科学，自然是关于人及社会的科学。如果没有历史学，我们就会失去探索人类本性的最有力的工具，获得的只是人性破镜的散乱残片而已。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说过一句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惟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8}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历史科学是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的，我们就不展开去论述了。许多著名学者均认为：学习历史是文科的基础，研究某一个问题，最好先读一两本历史书。历史揭示出一个事物存在的前因后果，从而帮助人们分析它的现在和将来。

再谈谈历史的“用”，这把话题拉开得远了一点。历史有什么用？怎么用？这是一个老问题。作为一个以治史为天职的学者，当然会感受到历史本身独特的美感，它千姿百态，令人销魂。但是，如果一门学科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其形象就会显得不那么完美。历史虽不能提供解救燃眉之急的灵丹妙药，但它可以提供借鉴，始终有利于增进人类的利益。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将历史学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归纳为以下五点：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上的事物的。谁要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有用，谁就要承认历史学有用。反过来，谁如果认为历史学没有用，谁就要接受这样一个推论——马克思主义也没有用。”^{¶19}二是“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它拥有极其丰富的典籍文物，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历史遗产，是中国史学的骄傲，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消化，从中汲取营养。中国不仅是一个大国，而且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它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而是跟世界许多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同这些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许多方面的历史。也需要了解我们同许多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发生过的不同意见、甚至争执。我们还要弄清楚我们同周围一些邻国或相距甚远的国家所发生的一些冲突，了解它们的历史真相。”^{¶20}三是“为了认识和处理当前的现实问题，不能不研究历史。”^{¶20}四是“历史问题本身就经常作为各种各样的现实问题，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我们是生活在历史中间的，历史上的问题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即使有人非常不喜欢历史学，可是生活也会迫使他去考虑历史学上的问题。”^{¶20}五是“还有许多比较抽象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回避。历史发展有没有规律性？历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有没有存在的可能？……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什么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至于说到中国历史学本身的继承问题，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也很多。”^{¶20}于是我就产生一个想法，一些公开出版的报刊上也都写到了，这就是历史，你可能接近它，却休想复原它，能做的是不讳过、不溢恶、不夸饰、不虚美，像老祖宗教导的那样秉笔直写。历史学家自己只管写出信史，求出真相，至于用不用，如何用，何时用，那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决策者的事，历史学家自己根本无法决定，而且也远远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

邢 道之不行久矣，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梁、段、李 悲观些了吧！一门基础学科总要有人去做，乐在其中吧！重要的一点，还是要将史学和现实结合得紧密些，参与社会，比如做些普及工作。

杨 这里还有一个文风问题。毛泽东曾批评梁启超说：“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毛泽东还说：“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f 18}现在有的人用汉字写洋文，比洋文难懂。写的文章或书的题目不知道它是属于那个领域的，像社会学又像管理学，读了正文才知道它是属于史学的。我总觉得文字用得通俗一点，省得人家读你的文章时要不断地查词典，不见得那样会显得你的学问高深。

[参 考 文 献]

- [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新大陆游记·附录二·夏威夷游记(专集之二十二)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9.186.
- [2]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自序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2.
- [3] 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 [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1 A 5 22 33 40 49 96.
- [4]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清代学术概论(专集之三十四)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9.8.
- [5] 戴逸. 世纪之交中国历史学的回顾和展望 [J]. 历史研究, 1998 (6) 5-10.
- [6]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新史学(文集之九)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9.7,10.
- [7] 魏源. 东南洋叙·海国图志 [Z].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9.120.
- [8]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自由书(专集之二)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9.59.
- [9] 严复. 严复集(第1集)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6.29.
- [10]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变法通议·论译书(文集之一)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9.70.
- [11]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8.171.
- [12] 列宁. 列宁全集(第29卷) [Z].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6.71.
- [13] 梁启超. 过渡时代论 [A]. 夏晓虹. 梁启超论文选集 [C]. 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 1992.267.
- [14]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文集之四十)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9.2 3 5 6 7.
- [15]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与严幼陵先生书(专集之一)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9.12.
- [16] 罗素. 中国到自由之路 [J]. 东方杂志, 1921, 18(13).
- [17] 林志钧. 饮冰室合集·序 [A].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 [Z]. 北京:中华书局, 1989.3.
- [18]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 [A].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Z].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21.
- [19] 范忠程. 博览群书的毛泽东 [M]. 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3.221.
- [20] 胡乔木. 关于史学工作的几个问题 [A]. 胡乔木. 胡乔木文集(第3卷) [C].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05,106,107, 109-110.

[责任编辑 徐 枫]